



伍明春 著

现代汉诗沉思录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
南帆 刘小新 主编



现代汉诗沉思录

伍明春 著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
南帆 刘小新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诗沉思录/伍明春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6. 5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南帆, 刘小新主编)

ISBN 978-7-5550-0659-6

I. ①现… II. ①伍…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9833 号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为 2015 年度福建文艺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现代汉诗沉思录

伍明春 著

责任编辑 何 欣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地 址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659-6

定 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总 序

◎ 南帆

“闽派批评”的称谓一度流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为数众多的闽籍批评家同时跻身于文坛，登高而呼，雄辩滔滔，许多重大命题的确立隐含了他们的思想贡献。强烈的理论兴趣无形中造就了一个醒目的群体，“闽派批评”即是对于这个群体的命名。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文学史上许多命名并非精心策划或者深思熟虑的产物，相当一部分美学潮流或者学术派别的命名是由于不无偶然的历史机缘，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朦胧诗”，或者“形式主义学派”“达达主义”“耶鲁四君子”，如此等等。“闽派批评”之称并非来自学术特征的严谨概括，这个命名毋宁说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闽籍批评家的人数明显超过了各个省份的平均数。

可以列举的闽籍批评家名单洋洋大观。一部分批评家长期身在京沪，例如谢冕、张炯、刘再复、陈骏涛、童庆炳、程正民、何镇邦、张陵、李子云、潘旭澜、朱大可等等。他们多半是年轻时外出求学，毕业之后就职于京沪的学院或者研究机构。另一部分批评家长期活跃在闽地，例如孙绍振、许怀中、刘登翰、林兴宅、王光明、俞兆平、朱水涌、杨健民、谭华孚、南帆等等。个别批评家的活动轨迹相对复杂。陈晓明当年已经在闽地崭露头角，继而求学、定居

北京；谢有顺求学于闽地，登上文坛的时候已经栖身于粤地。

如此多元的成长背景显明，闽籍批评家并未承传某种共同认可的文学观念。因此，“闽派批评”并非一个彼此师承或者同声相应的学派。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到主体论、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闽籍批评家活动在跨度巨大的理论场域，分别充当不同主题的领衔主角，譬如谢冕、孙绍振之于新诗论争，刘再复之于文学主体性，陈晓明之于后现代主义。

为什么闽籍批评家如此之多？如此旺盛的理论兴趣是否具有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朱熹、李贽、严复不仅是闽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他们的文学观点与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相互呼应。闽地的历史上还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家，他们在诗论方面尤有建树，譬如严羽、魏庆之、刘克庄等等。严羽的《沧浪诗话》最负盛名，“以禅喻诗”之说在诗歌批评史上影响久远。至于辜鸿铭、林纾、林语堂、郑振铎均为文化大师，他们分别具有独到的文学理解、文学实践与文学评判。总之，历史上的闽籍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以至于坊间有“闽人好论”的戏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考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集体崛起的闽籍批评家具体地受惠于哪些思想线索。他们相对一致的认识是，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无非是一个遥远的背景，“闽派批评”的浮现更多地取决于特殊的历史机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解放的叙事逐渐成为主旋律。作为解放叙事的先锋，文学承担了摧枯拉朽的使命。文学批评的意义是扩大战果，开拓理论纵深。闽籍批评家接手的第一个理论战役是“朦胧诗”之争。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一批风格迥异的诗人开始集结。他们的诗作充满了象征、意象和反讽，情绪忧郁、悲愤、孤寂，音调嘶哑。八十年代初期，这些诗作陆续出现在刊物之上，立即引爆了激烈的争论。对于习惯颂歌与战歌的批评家来说，这些诗作古怪艰涩，主题朦胧——令人气闷的“朦胧”是当时的著名评

语，也是“朦胧诗”之称的来源。这些诗人的中坚之一舒婷居于闽地，她的诗作被视为尖锐的挑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风？《福建文学》率先发起争论。一时之间，应者云集，诸多批评家见仁见智，蔚为大观。这一场争论成为许多闽籍批评家的发轫之处。

《福建文学》策动的论争延续到一九八〇年的“南宁诗会”，掀起了一次新的波澜。闽籍批评家谢冕、孙绍振勇敢地为“朦胧诗”辩护，张炯担任会议的组织和主持人。会议之后，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继而又在《诗刊》刊登《失去平静之后》。如果说，谢冕的主旨是告诫人们沉住气，保持宽容，勇于接受挑战，并且历数文学史上成功的变革，那么，孙绍振力图阐发的是新诗背后的美学原则——“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他的论文标题即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异于颂歌与战歌的传统，新诗追求的是“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在孙绍振看来，这种美学原则的深刻根源是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在当时，这些观点惊世骇俗，以至于谢冕、孙绍振不得不承受学术之外的巨大压力。时至今日，“朦胧诗”已经得到了文学史的认可，谢冕、孙绍振的“崛起”之说酿成了新的理论话题。王光明、陈仲义等闽籍批评家之所以能够对于新诗进行卓有成效的后续研究，他们的开疆拓土功不可没。

“朦胧诗”争论之后，众多闽籍批评家共同卷入的另一个理论事件是“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论争。由于解放的叙事纵深扩展，思维方式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再度走到了前面。如何解读文学？是不是仅有社会历史批评的唯一视角？各种零星的尝试和实验之后，理论的总结势在必行——“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于一九八六年的春天在厦门召开。当时，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或者接受美学等诸多西方批评学派尚未登陆，打动批评界的是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科学主义。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被

奉为时髦，不少文学研究论文以列举图表、数据与数学公式标榜科学精神。厦门会议的论辩之中，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诗与数学的统一显然是这种观点的美学追随。不过，过度的科学主义引起了另一些闽籍批评家的非议。在他们看来，科学方法仅仅提供各种描述真实的视角。如果无法确认文学批评力图阐述何种价值观念，批评家又怎么知道选择哪一种描述视角？因此，没有理由用貌似客观精确的科学话语覆盖人文情怀。

几乎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讨论同时，闽籍批评家刘再复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这种观点是文学对于主体哲学的致敬。刘再复分别阐述了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尽管现代哲学对于主体概念的种种质疑不可避免地波及文学主体性命题，但是，多数人深切地体会到隐藏于这个命题背后的苦心：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在这个意义上，闽籍批评家的理论工作显示了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众多闽籍批评家的知识谱系相距甚远，可是，他们不约地围绕相近的问题持续地思考，这只能解释为历史的迫切性。

“闽派批评”的出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年，王蒙曾经对文学批评发表过一个颇具影响的观点：“闽派批评”堪与京派、海派呈三足鼎立之势。籍贯、地域文化渊源、历史机遇——“闽派批评”命名的依据显然是三种因素的相加，尽管三者的意义并不相等。然而，这个命名之所以普遍流行，显然得益于几次影响广泛的批评实践。没有批评实践的支持，种种人为的舆论吹嘘走不了多远。必须补充的一个事实是，福建省文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办的一个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探索》为“闽派批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重要的舞台。尽管这个刊物仅仅存在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京、沪、闽三地众多闽籍批评家担任这个刊物的编委，刊物发表了“闽派批评”的许多

重要论文。因此，谈论“闽派批评”的组成范围，通常会提到《当代文艺探索》的主编魏世英，副主编王炳根、林建法、林焱和编辑王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闽派批评”之称逐渐淡隐。当然，这不等于闽籍批评家销声匿迹。一些批评家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老骥伏枥，他们仍然密切注视文坛的动向，不时发表真知灼见。更多的批评家精思不辍，开拓不已：谢冕对于诗歌一往情深，他的主要工作始终聚焦于诗歌领域；王光明、陈仲义与谢冕相近，诗歌的信徒是他们从未放弃的身份；相对地说，孙绍振的学术战线辗转不定，他曾经涉入普遍的美学问题，继而转向了微观的文学写作、经典文本分析和中学语文教育；刘再复移居海外多年，置身于另一种文化环境，沉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重大课题。如果言及闽籍批评家转身幅度之大，刘登翰或许是一个特殊的例证。他于九十年代逐渐转向了海外华文研究，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形成了学术梯队，其中佼佼者如朱双一、刘小新、朱立立和袁勇麟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将性别研究推向前台，闽籍批评家林丹娅积极介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至于陈晓明、朱大可、谢有顺俱已卓尔成家，他们广泛涉及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化的各种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由于学院造就的良好学术环境，许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闽籍批评家正在迅速地成熟……相对于闽籍批评家二十多年的工作状况，这些描述无疑挂一漏万，我企图借助这些描述提出的问题是：面对如此之多的学术资源，是否到了重提“闽派批评”的时候了？

重提“闽派批评”，制造乡贤的学术聚会或者地域文化表彰仅仅是次要目的。重要的是发现新型的话语平台，召回曾经活跃的批评精神。闽籍批评家是不是可以如同当年一般犀利骁勇，积极介入各种重大的文学话题，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很大程度上，这同时是

文化环境的迫切要求。

现今的文化环境之中，文学批评正在滑向边缘。娱乐新闻、明星八卦以及形形色色的游戏节目占据了大部分传媒的版面；许多人心目中，网络文学几乎等同于文学的范本。与此同时，经典文学体系的声望急剧下降，“严肃”正在某些人心目中演变为令人厌倦的品质。这时，文学批评何为？文学批评将在这个时代文化之中扮演什么角色？愈来愈多的批评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分量。二十世纪曾经被称之为“理论的时代”。繁盛的理论生产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多种考察文学、考察世界的视角。批评家可以发现各种文学话题，还可以借助文学话题阐述对于世界的各种观点。“闽派批评”的历史证明，由于批评家不懈的呐喊、辩驳、阐发和倡导，某些显赫一时的声音消失了，另一些大逆不道的观念逐渐成为共识。作为文化空间的开拓，文学批评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如果说，“闽派批评”的称谓曾经贮存了丰盛的文学记忆，那么，许多闽籍批评家即将开始面对另一个新的故事：这个称谓如何内在地织入文学的未来？

新生代批评家的加盟，即是这个故事的最新发展。唯有新生力量的持续涌现并且不断发出独特的声音，“闽派批评”才能真正重新出发，发扬光大。新生代批评家大多具有严谨的学术训练，理论视野开阔，他们代表了“闽派批评”的未来。编辑出版“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即是集中展示这些新生代批评家的实力与个性，注释“闽派批评”这个称谓的崭新内涵。

是为序。

（南帆，本名张帆，现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福建省文联主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和散文集多种，曾获鲁迅文学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目 录

早期新诗的合法性论纲	(1)
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	(22)
试论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	(36)
翻译与早期新诗的合法性	(52)
论早期新诗的“弑父”情结	(62)
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	
——论闻一多、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	(72)
早期新诗写作中的师者角色	(80)
歌谣：“新诗”的潜在资源	(89)
论五四报刊“新诗”栏目的盛衰	(100)
论新诗的现代想象	(108)
论早期新诗在中学的传播	(119)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130)
“新诗”美学合法性的自觉寻求	
——以徐志摩的活动为中心	(140)
文学场与政治场相互借力	
——论早期新诗的政治话语	(151)
论汉语散文诗的文类边界	(162)
论“九叶”诗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会合	(179)
现代汉诗的本位寻求	
——论王光明著《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189)

文化记忆、抒情策略和文类自觉

- 略论地震题材诗歌 (199)

抒情姿态的变化

- 现代汉诗与民生关系的一种考察 (207)

执着坚守与寻求突破

- 论新世纪以来的福建诗歌 (216)

暂未命名的诗艺旅程

- 福建“80后”、“90后”诗歌简论 (230)

- “中间代”：作为一个关键词 (236)

诗与思比邻而居

- 论郑敏1979年后的诗歌与诗论 (241)

先锋的守夜人

- 论余怒的诗 (253)

新诗写作疆域的开拓

- 论臧棣的系列诗 (261)

明朗的冥想与倾听

- 论余禹的诗 (270)

先锋的再出发

- 论巴客的诗 (280)

在形与质之间寻求平衡

- 论屠岸的十四行诗 (292)

重构女性与世界的关系

- 翟永明《女人》组诗简论 (299)

叙述“更高的虚构”

- 读陈苇近年的诗 (304)

“水”：多维想象和诗学隐喻

- 哈雷诗歌新作管窥 (309)

从回望记忆到直面当下

- 论缪克构的诗 (317)



撒娇，然后逃离

- 评谢宜兴的《北京日记》系列诗..... (325)

从月亮的背面出走

- 评西楼的诗..... (329)

足行大地，心在云端

- 评三米深的诗..... (336)

附录

批评话语和学术话语的互通

- 论伍明春的新诗研究..... 陈培浩 (342)

- 伍明春学术简表..... (351)

早期新诗的合法性论纲

自胡适 1917 年正式提倡“白话诗”^①以来，现代汉语诗歌^②就开始遭遇一种关于自身合法性的深刻焦虑。至少从写作语言和文体形式的层面考察，小

① 尽管胡适本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1月1日）一文可能迫于反对派的强大压力，对“白话诗”问题闪烁其词，然而其随后于《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2月1日）和第三卷第四号（6月1日）发表“白话诗八首”和“白话词”的举动，却旗帜鲜明。虽然胡适在 1916 年就对“白话诗”问题做了一些较为深入的思考：7月22日写了《答梅觐庄——白话诗》，8月21日的日记里更明确提出“白话作诗不过是我所主张的‘新文学’的一部分”，不过，这些言论毕竟只出现于某种非公开的场合。因此，这里把 1917 年当作现代汉诗寻求合法性的起点。

② “现代汉语诗歌”这一概念，简称“现代汉诗”，袭用自王光明先生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该书提出，作为对问题重重的“新诗”概念的超越性替代，“现代汉诗”体现了如下基本内涵：“以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本体要求三者的良性互动，创造自己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体现对中国伟大诗歌传统的伸延和拓展。”（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640 页。）不过，考虑到当时的语境和论述的便利，本论文的大部分场合仍使用“新诗”这一概念，并加上引号，以表明某种权宜性。



说、散文等文类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基本上具有实现一种“和平过渡”的可能^①，而现代汉诗的发生，则是一次带有明显断裂性的“突变”。用现代白话写作的“新诗”，不像在某些古代白话诗中那样，“白话”不过是五七言的古典诗歌形式的“招安”对象，相反地，它有效地打破了古典诗歌的形式边界。这就意味着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典诗歌以文言建构的语法和“诗法”的现代诗歌话语系统的开端。甚至与晚清诗歌那种“以内容和语言的物质性打破了古典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封闭性”的“物质性的反叛”^②不同，胡适提倡的白话诗，更偏向于发起一种具有明确的形式建构诉求的“语言性反叛”。或者说，“白话”是现代汉诗发生的一个有力支点。

而“白话诗”的首倡者胡适，正是十分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并以之作为诗歌语言变革乃至整个文学革命的突破口。这种反叛，构成对于既有诗歌美学规范的强有力挑战，也势必导致保守力量在接受心理上的剧烈排斥反应。在这一正一反之间，形成了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动态张力结构。正因为如此，与“新诗”的发生发展相关的议题，不仅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心所在，也是后人谈论五四新文学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尽管面临着各种指责和非难，对于“新诗”最初的生存状态，仍有不少人抱持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例如，对早期新诗所取得的成绩，第一部新诗作品合集——《新诗集》的编者早在1920年就满怀信心，并迫不及待地做出一种总结，以回击所谓的“怀疑派”：“自从胡适之先生提倡‘新诗’以来，一天发达一天；现在几乎通行全国了！不过大家还有一些怀疑；以为他是粗俗，音节也不讲，总比不上老诗的俊逸，清新，铿锵，……我们现在编印这《新诗集》，

① 例如，周作人在谈到五四散文的“发达成功”时，特别提到所谓“内应”的作用：“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见周作人：《导言》（周作人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10页）。而夏志清曾将白话诗与白话小说作了这样的对比：“白话小说本来就有很长远的传统，因此在吸收西方小说的新技巧方面比较容易。可是中国旧诗的传统中，能够对新诗人有所帮助的地方就不多了。”见夏志清：《文学革命》（夏志清：《文学的前途》，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9页）。与周、夏相比，胡适虽然也试图从古代的白话诗作品中寻找新诗发生的某种历史逻辑，却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

②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一方面就是汇集几年来大家试验的成绩；一方面使怀疑派知道——新诗虽是只有了二三年——各处做的很多，也很有精彩，将来逐渐研究，一定还要进步！从此以后，他们的怀疑，便可‘冰消瓦解’了！”^①而另一部新诗选本的编者，对其所“抄录的白话诗”“欢迎的了不得”，并对“白话诗的好处”赞赏有加。这位编者还自信地表示，该选本的目的在于“把白话诗的声浪竭力的提高来，竭力的推广来，使多数人的脑筋里多有这一个问题，都有引起要研究白话诗的感想”^②。

更有甚者，在盘点1919年诗坛状况时，居然已经有人如此充满热情地描述“新诗”作品的“输出”现象：“自《新潮》出世后，日本的报章杂志如《大阪每日新闻》、《中央公论》等，翻译中国新诗的颇多。而康白情、傅斯年的翻译过去的尤多。”^③以上关于“新诗”的种种乐观主义的叙述，实际上也是对现代汉诗合法性寻求的一种重要支持。

与此同时，在那些“新诗”支持者中，也有人开始流露出一一些疑虑。自称写“白话诗”只因看到“诗坛寂寞”而“打打边鼓”的鲁迅，很早就曾十分精准地指出早期新诗的某种弊端：“《新潮》里的诗写景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此后能多有几样作风很不同的诗就好了。”^④这个肯綮的意见，得到了《新潮》编者傅斯年的认同。^⑤而早期新诗的重要实践者和鼓吹者朱自清，在“新诗”发生伊始，也清醒而敏锐地察觉到新诗坛虚假繁荣背后“沉寂”的真相：“从五四以来，作新诗的风发云涌，极一时之盛。就中虽有郑重其事，不苟制作的；而信手拈来，随笔涂出，潦草敷衍的，也真不少。所以虽是一时之‘盛’，却也只是‘一时’之盛；到现在——到现在呢，诗炉久已灰冷了，

① 新诗社编辑部：《吾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新诗社编辑部编：《新诗集》（第一编），上海：新诗社出版部1920年。

② 许德邻：《分类白话诗选·序》，许德邻编：《分类白话诗选》，上海：崇文书局1920年。此处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重印本。

③ 编者：《一九一九年诗坛略记》，北社编：《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

④ 鲁迅：致傅斯年，《新潮》第一卷第五期，1919年5月1日。

⑤ 傅斯年的回应是：“先生对于我们的诗的意见很对。我们的诗实在犯单调的毛病……我很后悔我的诗不该发表。”见《新潮》第一卷第五期，1919年5月1日。

诗坛久已沉寂了!”^①

现代汉诗的发生，不可能只是纯粹意义上的文类之间的更替变迁，而是一次相当激进的“革命”，折射着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意识形态的驳杂阴影。正如陈平原所言，“‘五四文学革命’并非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很大程度依赖于外力的推动；思想史意义的召唤，使得不少本不以文学见长的学者，也都投身‘白话诗’的尝试。”^②早期新诗合法性的寻求，其实是在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这一大框架下进行的，同样必须依凭一种复杂的语境和错综的“外力”才能得以充分展开。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早期新诗作者康白情在诗集《草儿》的自序（1921年作）里，并不像他的老师胡适那样乐于在“戏台里喝彩”，为“新诗”的合法性辩护，而是一边声称“我不是诗人”，一边又把自己的诗标举为“新文化运动里随着群众的呼声，是时代的产物”，甚至还颇为暧昧地谈及一般被当作五四新文学革命对象的“诗教”：“小时候先父以诗教教我，自问还毫无所得。编《草儿》的时候，每想到已不能再承庭训，心痛不已。”^③康白情这种似是而非的做法，在早期新诗作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内在的逻辑理路，却无疑是一种偏向于对“新诗”的肯定。因此，对于现代汉诗合法性问题的考察，必须对“过程的复杂性”细加辨析和清理。

二

如果说胡适最初的“白话诗”写作，还只是实验室里的“实地试验”，那么，当他和《新青年》相遇之后，“白话诗”作为一种新生文类，就开始走向公开化，谋求一种“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正式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之前，曾经和“旧诗”作者打了一场虽不算激烈，却颇具意味的话语场地的争夺战。事情的起因，是谢无量在《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一卷三号上发表的一首五言排律，引起胡适的极端不满。他致信编者陈独秀，尖锐

① 朱自清：《〈冬夜〉序》，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四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5页。

②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陈平原等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P218。

③ 康白情：《〈草儿〉自序》，康白情：《草儿》，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社1923年。

地指出发表这首“古典主义之诗”的做法与《青年杂志》倡导的“写实主义”文艺的主张之间的矛盾，并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地揭示出该诗的诸多“不通”之处，最后顺水推舟，提出“文学革命”的八条主张。^① 这些主张，仿佛是胡适名文《文学改良刍议》^② 出场前的一次“彩排”。

陈独秀对此的回应貌似不温不火，实则绵里藏针：“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惟今之文艺界写实作品，以仆寡闻，实未尝获观。本志文艺栏，罕录国人自作之诗文，即职此故。……若以西洋文学眼光，批评工部及元、白、柳、刘诸人之作，即不必吹毛求疵，其拙劣不通之处，又焉能免？望足下平心察之。”^③ 在这里陈独秀委婉地批评了胡适“全盘西化”的激进态度，并对胡的“八事”主张中的第五、第八两条提出异议。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青年杂志》一卷五号开始，直至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首次发表胡适的“白话诗”，这个杂志就再没有刊登旧体诗。这样的“空场”现象，仿佛是对呼之欲出的“白话诗”粉墨登场前的一次隆重预告。对“白话诗”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重大胜利。

继《新青年》首次发表“白话诗”之后，《每周评论》《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晨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清华周刊》等报刊也纷纷响应。到了1922年，《诗》月刊^④的创刊，更标志着“新诗”从此拥有一个更为独立的空间。其实，早在1919年，胡适就不无夸张地描述过“新诗”发展的“喜人”形势：“现在做新诗的人也就不少了。报纸上所载的，自北京到广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诗出现。”^⑤ 媒体的支持，不仅为“新诗”提供了最初的话语空间和传播平台，也培养了一个全新的作者群和一个全新的读者群，换句话说，就是构筑起所谓的“新诗坛”。

① 胡适：致陈独秀，《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通信”栏，1916年10月1日。

②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1917年1月1日。

③ 独秀：复胡适，《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通信”栏，1916年10月1日。

④ 《诗》，月刊，1922年1月15日创刊，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主编，中华书局出版。该刊前4期（一卷一、二、三、四号）“编辑兼发行者”是“中国新诗社”，后3期（一卷五号，二卷一、二号）改为“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之一”。1923年5月15日终刊，共出7期。

⑤ 胡适：《谈新诗》，《星期评论》纪念号，1919年10月10日。